

人大国发院十大核心产品系列

# 政 策 简 报

2018年12月 第23期 总第49期

## 行为实验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的应用

王湘红



—— 中国人民大学 ——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 人大国发院简介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国发院）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独立的校级核心智库。国发院以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学科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以新型研究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和公共交流平台为载体，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作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人大国发院坚守“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的目标，着眼于思想创新和全球未来，致力于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进步。

国发院通过学术委员会和院务会分别对重大学术和行政事务做出决策。目前由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担任院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楼

网站：<http://NADS.ruc.edu.cn>



人大国发院微信

## 作者简介

王湘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政策、劳动和消费行为，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论文发表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并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国际行为经济学促进会中国区代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首届行为分会委员。

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

媒体热线：程建平； 办公电话：010-62625159      15601321015

---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

主编：聂辉华

编辑部主任：邹静娴

本期责编：邹静娴 程建平

## 摘要

行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进入公共政策设计的视野。基于国外公共政策领域的助推经验，国内行为实验经济学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设计应用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行为实验经济学主张在政策和机制设计中采取温和家长主义的助推方法，主张以小拨大，改善决策构架，在提升多数人福利的同时，不对理性决策者增加过多成本，这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目前，行为实验在政策设计的具体应用与评估中已经发挥了不少重要作用。针对公共政策设计这一主题中的促进合作的机制实验、器官捐赠中的助推机制、行为合约的政策启示、收入分配的实验、健康消费的助推机制等不同侧重点，人大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于11月15日举办了讨论会，组织多位行为实验经济学者进行了研讨。本文对会议内容进行总结。

## 一、引言

传统的公共政策设计方案采用立法、规定等手段强迫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成本高昂，且在现实实施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较大的阻力。近年来，行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入政策设计的视野。行为实验经济学主张在政策和机制设计中采取温和家长主义的助推方法，主张以小拨大，改善决策构架，在提升多数人福利的同时，不对理性决策者增加过多成本，因此将心理约束机制引入规则制定，运用助推手段可以提高彼此的信任度，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2010年英国内阁办公室成立了行为透视团队，又称之为助推小组。其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提升政策效果，帮助政府节省了20倍以上的费用。2013年到2017年，行为透视团队在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健康、教育、能源、社区、消费等领域进行颇有建树的介入。2015年美国总统一发布行政命令——运用行为科学透视来更好服务美国人民——开始在联邦政府项目中运用行为科学知识。根据行政命令，在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成立社会和行为科学团队，提供咨询服务。目前国内公共政策领域相应的行为实验经济学的应用正在起步。2018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举办了“行为实验在政策设计中的应用”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湘红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叶航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李建标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杜宁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代志新助理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郑捷副教授等多位行为实验经济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围绕行为实验政策设计这一主题，专家学者们从促进合作的机制实验、器官捐赠中的助推机制、行为合约的政策启示、收入分配的实验、健康消费的助推机制等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报告，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教授总结。

## 二、道德和信息在公共政策机制设计中的作用

### （一）道德偏好在合作型政策机制设计中的作用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航认为政策设计的合理假设需要考虑人性道德偏好，在促进合作的政策机制实验中充分发挥人善良特质的积极作用。

首先，叶航教授通过举例幼儿园家长迟接小孩实验和核废料填埋搬迁山村实验来指出在实验中人性自私的基本假设会挤出人性道德偏好，因此完全按照人性自利假设的政策设计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其次，叶航教授以无偿献血、无偿器官捐献、主动给行人让道以及共享单车为例，强调在实验设计中应注重思考如何激发人的道德偏好，调动人的同情共感以及道德责任感。第三，叶航教授介绍了其团队目前研究的信任博弈实验，该实验包含了匿名博弈、非匿名博弈、完全信息博弈、可修正的信息博弈四个阶段，特别是在第四阶段给予参与者修正不良记录的机会。结果发现合作中的背叛者若被给予修正机会，会表现出极强的愧疚感，进而更加珍惜声誉，增加信任促进合

作。叶航教授强调，好的政策设计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出人的善良特质对于政策效果的积极作用。

## （二）信息在行为实验政策设计中的作用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郑捷认为大众信息传递可以降低知识水平不平等性。

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做决策，但决策者在做决策时也许会过多考虑来自他人的信息。郑捷教授指出实验所要分析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固定问题，对每一个问题而言，有没有信息对这个问题本身回答是否有变化；第二个层面是，每个实验组被试不一样，基于被试分析，按照成绩排序，将成绩比较差的被试在不同的实验组内相互比较，即知识水平较高和较低的情况下，考察在有信息和没有信息下的异质性。郑捷教授表示，从结果来看，对于容易的问题来说，信息确实是可以提升绩效，但对于难的问题信息可能会降低绩效。对所有人来说，总成绩可以通过得到信息来得以提升，但是那些相对知识水平低的人提升更多，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提升比较少。大众信息传递，可以让知识水平不平等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较高知识水平而提高平均知识水平。

## 三、行为实验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的几个应用案例

### （一）促进合作型政策机制实验在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建标认为誓言作为一种事前承诺机制有利于促进器官捐赠的激励效果，能够显著提高器官捐赠率。

誓言是以宣誓的方式作出的公开性承诺。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承诺理论，一些研究认为誓言作为一种事前承诺机制，会对个体产生较高的道德约束力，从而影响他们后续的决策行为，比如，誓言能够诱导出人们的真实偏好，增加人们的合作和诚实行为。

李建标教授指出，誓言不仅是作为一种事前承诺机制，还是一个有利于促进器官捐赠的激励机制，能够显著提高器官捐赠率。誓言具有公开性和仪式性，宣誓人宣读誓言时必须在有见证人的公开场合，并且需要遵循特定的礼仪和姿势。所以，誓言不仅可以提高宣誓人的承诺履行度，还会让宣誓人感受到强烈的庄严感和仪式感。因此，誓言对个体的器官捐赠行为有激励作用。李建标教授通过引入一个新的器官捐赠激励机制，实验检验了有宣誓与无宣誓情境下的捐赠率，结果发现在没有制度经验时，被试在推定同意规则下的捐赠率更高，但是在成本和收益结构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从推定不同意默认规则转变为推定同意默认规则不能提高器官捐赠率水平。因此，誓言作为一个全新的器官捐赠助推机制，为政策制定者设计器官捐赠助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 （二）行为合约设计在承诺、格式化评价和小微信贷等方面的应用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宁华认为合理的行为合约设计更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杜宁华教授表示，现实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方面，交易中的细节往往无法通过合约进行表述；另一方面，即便在合约中

对交易细节进行了约定，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很难约束监督。而以市场参与者的自利偏好为出发点、以物质激励为基础的传统合约设计往往需要在合约中提供详细的交易细节，同时忽视合约的法律监管成本。因此如何设计更为合理的行为合约需要很好的思考。杜宁华教授介绍了其团队近几年在行为合约设计方面展开的研究工作：首先是研究了承诺作为一种行为约束机制，由雇员提出对自身努力水平进行考核承诺后，对其行为约束力最强，提供努力水平最高，实现结果也最大。其次，研究了格式化评价在合约机制中的作用。雇主对雇员的事后评价是一种不直接带来物质后果的行为机制，在特定工资水平下表扬对于员工选择高努力水平有影响。最后是将行为合约机制应用于小微信贷，自然实地实验结果表明正向期待信息与负向结果信息均能显著提高小微信贷还款比例，但是告知对方负面后果的方式仅能在短期内降低债务超期时间长度。

### （三）行为实验政策设计在公共品服务方面的应用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助理教授代志新认为绝对值下的框架效应更利于提高公共品贡献水平。

虽然关于收入分配的异质性影响的研究已有众多，但鲜有研究检验对于相对比例值与绝对量下分配的框架效应的影响，因此代志新博士等人研究了在组间异质性和收入异质性下一个线性公共品博弈中框架效应以及愿意贡献的最低贡献水平。代志新博士指出，首先，随着高收入增加，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都会贡献的更多，表明人在公共品领域中是有条件的合作的；另外，绝对值下的框架效应使得贡献显

著高于相对比例值下的水平；最后，最低贡献水平作为确保公共品中的个人贡献量的政策手段，设置最低贡献水平缩小了这种差异。

#### （四）行为实验政策设计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应用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认为，在最后通牒实验框架下绝对值和相对比例等不同的提议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

在收入分配方面，经常出现不同主体之间互相讨价还价的现象，例如雇主与雇员的谈判、合作者的分成等，但在现有研究中关于绝对值和比例的讨论是被一视同仁的，鲜有研究比较两者的细微区别。因此，孙文凯教授等人使用最后通牒实验，探讨不同的提议方式是否会导致收入分配结果不同。孙文凯教授指出，首先，提议方式与禀赋高低之间有交叉影响；另外，相对比例方式提高了在高禀赋条件下的平均提议金额；最后，当禀赋水平低时，相对比例方式下接受者的最小接受额会更低。这项研究从政策设计上对收入分配具有启发意义。

#### （五）行为合约设计在健康消费方面的应用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湘红认为自我约束规则和同伴约束规则能够显著改善自我控制问题。

从激励设计方面，劳动领域的研究通常考察在劳动场合怎么用自我激励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而鲜有文献探讨同伴合约和自我控制合约的替代性如何。王湘红教授等人从行为实验经济学角度出发，以跑步行为为例，设计与自我约束、同伴约束相关的承诺合约，研究非理性偏误中的自我控制问题和同伴效应对健身行为的影响。实验在招

募过程中有意识地招募了两类被试者，一类是带一个人一起参加实验，成为熟人同伴；另一类是将单个报名者随机配对。因而分为两类——熟人同伴和陌生人同伴。王湘红教授指出，相对于无约束控制组，约束规则是有显著的效应；自我约束规则对一周的跑步次数、跑步总距离和跑步总时间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伴约束规则对有效打卡奖励金额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自由选择合约对跑步表现没有显著的效应。自我约束规则和同伴约束规则能够显著改善被试者的自我控制问题，对跑步锻炼有所裨益。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25>